

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丛书

WOSUO ZHIDAO DE MINGREN MISHI

他们是 怎样败落的

TAMENSHI ZENYANG
BAILUO DE

文 昊 / 编

一手
独家史料
亲历亲见
亲闻

说官说商 说权说钱 说名说利 说情说义 说文说武 说谋说计
——点击显要名流，细说鲜为人知的前尘往事
读成读败 读得读失 读起读落 读兴读衰 读浮读沉 读荣读辱
——聚焦人情世事，读懂命运福祸的因果缘由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丛书

他们是 怎样败落的

文 昊/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们是怎样败落的/文昊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1

(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

ISBN 7 - 5034 - 1591 - 6

I. 他… II. 文… III. 政治人物 - 生平事迹 - 中国 - 清
后期 ~ 民国 IV. K82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066 号

责任编辑: 于保政 封面设计: 孙少伟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北京雅龙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375 字数: 385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224 元 (本册定价 28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从历史细节读成败因由（代序）

“读史使人明智。”但这并不等于说，无论是谁，只要读一读历史，就一定都能变得“明智”起来。若要真正取得“读史使人明智”的效果，则必须对历史的认知达到“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程度。假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史实的了解不够全面、细致、深入，那就不可能从“史实”中得出正确、有益的“史识”。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可见，历史是多层多面、纵横交错、纷纭复杂、千变万化的，历史的发展演化是一种“合力作用”的产物，而要读懂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就应该尽可能走进历史的深处，多方面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

说到“历史细节”，就必然涉及到过去的人和事——既包括已成昨日的人生，也包括已经发生的往事。事因人起，人以事存，人和事总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当然，作为历史细节的“人”和“事”，不是大而化之的“大事记”，仅仅提纲挈领地罗列出“某人在某时某地做了某事”，而是要说

出“某人为什么要做某事、具体是怎样做的、结果如何”等诸多具体而微的琐细之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个性因素。

爱因斯坦认为：“如果不深刻研究科学创立者的个性发展状况，那就只能了解科学工作的一般内容，而不能理解这些工作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也就是说，每一项重大科学成就的产生，都是与创造了该成就的各位科学家自身的个性特征息息相关的。这个观点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的人，其成就大小乃至事业兴败，都同样能从他们的个性品质中找到答案。正因如此，所以在读史时就不能不注意考察各种人物的个性因素。

拿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各种人物的兴衰成败来说，无不与其固有的个性密切相关。比如，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是心性狡诈、热中耍弄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既善于结党营私，也精于利害算计；既深知拥兵自重、以武力为后盾的重要性，也明了摆弄权术、玩弄他人于股掌之间的种种“韬略”。而世人在读有关他们的历史时，则大多只关注于他们“以阴谋起家”的一面，却忽视了其“以阴谋败家”的另一面；或者仅看到他们上台后“满朝朱紫贵，尽是一家人”的“空前盛况”，却无视于他们倒台时“树倒猢猻散，限来各自飞”的凄清落寞场景。一旦忽视某些重要的历史细节，就很难对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结果便会得出错误的历史经验，当然也不会变得更加“明智”。

又如，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应当算是北洋军阀中“执牛耳”的佼佼者，但其在反动阵营中却也并未做到“一呼百应”，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掀起了文争武斗。究其原因，除了段祺瑞个人迷信武力统一、刚愎自用等缘由外，还与他信任并重用徐树铮这个人有很大关系。以民初政坛上有名的“府

院之争”为例，这场政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总统府秘书长丁佛言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之间的争斗：当时，府院之间的很多政务都不是通过黎段之间直接商榷、决定的，而是由丁、徐二人每日彼此洽谈沟通；然而，丁佛言是一个粗鄙无学、浅躁无识却又好大喜功、喜欢揽权自为的“十足官迷”，而徐树铮则是胆大量小、貌智心愚而又惯于煽风点火、搬弄是非的“小扇子军师”，这样两个负气逞才的著名好事之徒“狭路相逢”，怎能不兴风作浪，上演一出争权夺利的好戏呢？不过，在一般的历史书中却很少谈及这类情节，以至人们虽然大都知段祺瑞有刚愎自用的性格，但却很少知道他还有“刚愎他用”的情形。

许多史书通常都是忽略细节的，然而，只有更多地关注历史细节，才能读懂历史背后的历史，洞察常情深处的隐情，进而体悟出人生世事或成功或失败的内在复杂因由，在品读历史的过程中逐渐使自己变得愈加“明智”。

司马迁说他著《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而这句话恰恰也从历史细节的角度点明了人生世事的兴败关键，就是“天”、“人”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具体而言，也就是“天时”、“人为”、“人为与天时之间是否相得益彰”这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从根本上说，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要受其所处时代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

“时势造英雄”这条客观规律，所体现的正是“天时”对于人事兴败的作用。因此，古人便有了“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的感慨，孟子才会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镞基，不如待时。”所谓“时势比人强”，如果社会环境或组织环境没有给人们提供有利于施展才华的客观时势，或者客观时势虽然有利而个人却不知如何充分加以利用，甚至逆时势潮流

而动，那同样都会走向失败之途。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黎元洪之被举为民国总统，康有为之复辟失败等诸多史实，无不验证了这个道理。

其次，在同样的客观时势面前，不同的人之所以有成败之分，且其成败有程度大小之别，则是由于个人及其团体的具体状况所致。这就是决定人事兴败的“人为”因素。

杜牧有句诗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然而，这个说法只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客观时势，却忽视了人为因素——试想，如果把“雄姿英发”、智勇双全的周瑜换成胆小如鼠、只顾计较个人利害荣辱的张昭，那么即使客观时势再有利十倍，也同样逃不脱“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凄惨结局。可见，一味与世浮沉、俯仰由人而不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话，也不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此外，无论“天时”还是“人为”因素，其对于人事兴败的影响最终必将体现和统一于二者之间是否能够相互为用、相得益彰。“天时”和“人为”因素的具体结合状况，通常决定了人事兴败的时间长短。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此新旧蜕嬗之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

中，新旧不同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从一定意义上说，陈寅恪先生说出了人事兴败的原因所在，尤其从短期来看更是如此。但正如美国思想家、政治家富兰克林所说：“你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同一个人，也能在同一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做到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一旦把观察的视角延伸到历史的长河中，则会发现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只不过历史的演变所遵循的是一条“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客观规律而已。

世无艰难，何来人杰？事实上，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沧海横流，才见壮士豪情。那些“不肖者”尽管颇有机巧，但却不免遭遇“速生速灭”的命运，在发迹之后不久就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真正的“贤者”虽然笨拙一些，但他们的德行和功绩则会被世人永远铭记，终将彪炳史册。“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其理即在于此。

一般说来，由于历史本身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及其惯性等原因，使得“天时”与“人为”因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常常会表现出一种“滞后现象”。正因如此，所以一些人总被浮华遮望眼，常常为了图一事之利而遗一世之害，逞一时之强而留百代骂名。这种“过把瘾就死”的想法和做法，其实是一种鼠目寸光和浅薄无知，既不给自己留后路，更想不到给后辈子孙留条路。

每逢社会转型期，由于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故而人生命运就更加难以预料，且世事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在此情况下，就使得上述“滞后现象”常常直接表现为

“现世现报”。这种情况，无疑更加有利于人们从简短、急速的历史变化中读懂人生世事的成败因由。

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四个最混乱的时代，一是“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二是儒学衰微、“名士”勃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是鲜讲廉耻、注重实利的五代十国时期，四是内忧外患、变乱频仍的清末民国时期。其中，尤以清末民国时期更被称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劫巨变”，这一段历史发展的曲折多变、纷纭复杂、五彩斑斓、多灾多难，更加呈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迷离之色。因此，对于这段时期的历史，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就给予了充分关注和高度重视。

1959年，周恩来给人民政协提出了一项新任务，那就是征集文史资料。当时，他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他还说：“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要勇于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从那时起到现在，人民政协所征集的文史资料数以亿字计，可谓汗牛充栋，洋洋大观。

概而言之，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的最大特色和优点即在于“亲历、亲见、亲闻”。其作者大都经历过近现代中国社会动荡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接触过诸多重要历史人物，有的作者本身就是名重一时的显要名流，他们不仅阅历丰富，而且来自各个方面，既有过去的军政界要人，也有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因此，他们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而做出的回忆，无疑可以补充、匡正历史文献的缺失与不足，有助于人们更加弄清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前人写史尤其是修“正史”时，或因顾虑见忌于

当道说“实”，或因担忧诟病于后人说“俗”，所以常常有意无意地隐去一些虽然琐细但却重要的情节而仅记其概要大略，并在彰否人物、点评事件时显得四平八稳，甚或故意多有溢美之辞，结果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所谓“正史”便成为清一色的“为帝王将相做家谱”了。相比之下，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则除了要求在内容方面尽量做到“求真写实”之外，在选材与写法上则往往可由各位作者自由选择，随意行文；即使对于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记述，常常也会采取杂糅多家、诸说并存的态度。再加上作者们都早已过了“不惑”、“知天命”之年而步入了花甲岁月，对人情世事的认识和感悟自然更加洒脱、透彻。所有这些，都有利于读者更好地辨别历史的真相，理清人事兴败的来龙去脉。

《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丛书，就是从这些文史资料中经过精挑细选之后编辑而成的。本套丛书选取的史料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中的典型人物及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这些人曾经都是名人，他们或权倾当道，或名动一时，或雄踞一地，或富甲一方。当然，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官员，也有商人；有华人，也有洋人；有军人，也有文人；还有遁入空门的出家人……

虽然人们常说“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但实际上，人生并不总是梦，往事亦非都如烟。尤其对于那些发生在大动荡、大转折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生经历和纷繁世事来说，后人更需要多一些了解和认识。

当然，“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而且，由于不同人在思想、见识、立场、偏好、职业、家世、个性和人生阅历等各个方面存在差异，以及每个人所接触和关注的历史细节可能有所不同，因而在读史过程中往往也会品出不同的味道，悟出不同的道理。

比如，孔子读出了“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诸葛亮读出了“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唐太宗读出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王安石读出了“治大国如烹小鲜”，司马光读出了“君明臣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曾国藩读出了“内用黄老，外用儒墨”；胡适博士读出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鲁迅先生读出了历史“吃人”的一面；周恩来读出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毛泽东读出了“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观人必于其微，从小可以见大。读史之道亦然。若要从历史中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教益，就应该从历史细节中读懂成败因由。

于保政

2005.1. 北京

目 录

从历史细节读成败因由（代序）（1）

肉食者鄙，误国败家（1）

古人云：“国之大事，肉食者谋之。”但无情的历史反复证明，“肉食者鄙”几乎已经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每一个朝代都未能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更替的规律支配。这到底是为什么？个中原因，不但耐心寻味，更且发人深省。

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昔日的皇族帝胄往往命运多舛，步履维艰。虽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也别忘了“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更何况“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生在失败、没落之后的滋味必然是苦涩、难耐的，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世人通过了解他们的败落之路、解读他们的败落之因后，当既可丰富对人生世事的洞察和体味，亦可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母鸡司晨，国之不祥”？——我所知道的军机处和

西太后（1）

清朝贵族家庭的种种内幕与没落过程（12）

恭王府和恭王府典卖房产土地的经过（55）

我的祖父端郡王载漪在庚子被罪后的经历 …………… (64)

逆流而上,自寻死路 …………… (122)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所谓“时”和“运”,其实就是时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及其提供的有利条件。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事业成败无不与时代息息相关,因而若要保持长期兴盛不衰,就必须认清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反之;如果逆流而上、一意孤行,则无异于自寻死路。

可是,民国时期的南北军阀们却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常常为了逞一时之快而自鸣得意,忘乎所以。他们无视古人的提醒和告诫:“倾国宜通体,谁来独赏眉?”因此,这些人都是以一时一事的成败、一城一地的得失来评价人生的幸福与否,却忘记了这样一条普遍真理:人生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朱门早达笑弹冠”,而在于“白发天伦笑傲然”;不在于“少年之春,鹤立鸡群”,而在于“垂暮之年,衣锦还乡”。

他们是怎样败落的

2

- 袁世凯近臣对帝制活动的支持与抵制 …………… (122)
- 唐天喜的背叛与袁世凯之死 …………… (136)
- 从鼓吹帝制到穷困潦倒的袁克定 …………… (138)
- 袁世凯家族走向没落的经过 …………… (141)
- 江苏督军李纯的自杀及其遗族的没落 …………… (149)
- 徐树铮兵败之后的活动及遇刺经过 …………… (167)
- 吴佩孚从东山再起到彻底溃败的内幕 …………… (177)
- “湖南王”汤芑铭的穷途末路 …………… (193)
- 皖系“中坚”张敬尧的兴衰 …………… (202)
- 张宗昌从兴起到败亡的经过 …………… (209)

孙传芳五省联军被改编及覆灭	(234)
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	(241)
四川军阀陈鼎勋的 12 年春梦	(275)
“新疆王”金树仁被捕判刑的内幕	(281)

机关已算尽,兵败如山倒

综观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诸多阴谋家,蒋介石与其中任何一个相比可以说都毫不逊色,堪称古今阴谋的“集大成者”。但事实证明,无论多么高明的阴谋都是不可能长期奏效的,而是很快就会败露。

蒋介石最初以阴谋和野心而获得了成功,但最终却同样因为阴谋和野心而黯然下台,走向溃败。他的结局恰恰应了这样一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与此同时,蒋介石的机诈权变也为其手下人做出了“榜样”,从而导致了“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的恶果。

“回光返照”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	(301)
蒋家王朝末日的狐鼠哀鸣	(309)
蒋介石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	(313)
蒋军长江败退和淞沪溃逃的狼狈情形	(341)

卖国如卖家,害人终害己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英雄末路,美人迟暮”;但事实上,人类最大的悲哀却是从成功到失败、从显贵到卑微、从受人追捧到被人蔑视、从“堂上客”到“阶下囚”的急转直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的汉奸群丑,昔日也算

得上是无限风光或不可一世的得意政客。但是，由于他们走上了卖国投敌、认贼作父的不归路，所以就注定了自己难得善终的结局。“多行不义必自毙”，当这些汉奸们最终步入想做平头百姓而不可得的凄惨境地时，大概也会领悟这样一个道理：“卖国如卖家，害人终害己。”

- 因卖国而受重创的曹汝霖 (352)
- 卖国巨奸汪精卫的凄惨结局 (363)
- 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之死的真相 (366)
- 投敌附逆的傅筱庵被杀内幕 (383)
- 缪斌赴日内幕及其致死原因 (404)
- 陈公博、储民谊、陈璧君身陷囹圄之后 (409)
- 大汉奸陈公博受审与就刑的经过 (417)
- 大汉奸周佛海从脚踏两船到一命呜呼的下场
..... (422)
- 石友三酝酿投敌和被捕杀的前前后后 (436)
- 我所亲历的伪满洲国走向败亡历程 (456)

肉食者鄙，误国败家

古人云：“国之大事，肉食者谋之。”但无情的历史反复证明，“肉食者鄙”几乎已经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每一个朝代都未能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更替的规律支配。这到底是为什么？个中原因，不但耐心寻味，更且发人深省。

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昔日的皇族帝胄往往命运多舛，步履维艰。虽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也别忘了“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更何况“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生在失败、没落之后的滋味必然是苦涩、难耐的，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世人通过了解他们的败落之路、解读他们的败落之因后，当既可丰富对人生世事的洞察和体味，亦可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1

肉食者鄙，
误国败家

“母鸡司晨，国之不祥”？ ——我所知道的军机处和西太后

说清代军机处

清初沿明末制，以大学士司票拟，而大政胥决之皇族，或御前大臣之属。大学士已非行政总汇，与汉之丞相，唐之中书

门下，宋之平章事，元之中书省，明初之丞相，皆绝不同，以副署、封驳，皆无规定，仅类唐宋之翰林学士知制诰而已。逮康熙初，以南书房兼司撰拟，其权益分。自雍正初设军机处，又规定封奏皆由奏事处立达御前，军机大臣不得先寓目，于是军机处亦成一撰拟文字机关。加以每日视朝，万几决于俄顷，虽军国重事，亦绝无从容讨论之余暇。清制元首每晨兴于早膳时阅看各奏折后，分为留中及该部议奏、该部知道、依议、知道了各种，发交军机处（亦有留中之件即存大内，并军机大臣不能见者）。军机大臣赶速阅看原件，一面默拟办法，一面将例行之件由军机章京发交各部听事人员领回。元首即于其时召见内外臣工（凡预备召见之人，皆先递绿头签，上书职官姓名，于御膳时呈入，故又称膳牌，凡不见者，先将膳牌发下，其人即散，留者乃依次召见），见毕，最后始见军机大臣。大约军机大臣阅各奏章，至多一句钟耳。人对时，领班军机居前跪，领班距御座丈余，益次益远；如系军机大臣上行走，或学习行走，则必在二丈外矣。年高耳不聪者，往往穷年累月，旅进旅退，并不知元首及领班所言者何事。因元首例只与领班言，非指名询他军机大臣，他军机大臣绝无越次以对之事，亦无法于其时转问同僚，只于退入军机处后，有机会得知梗概耳。故军机处亦只领班略有权，他皆伴食（其间间有特殊情形，如孙毓汶、荣禄、袁世凯、张之洞、瞿鸿禨之任军机大臣，太后每有指名询问之事，故权亦增重）。领班几例为亲贵，大抵不学无术，或有术而无学，于仓卒之间，长跪之时，平章军国重事，无辅弼无时间可以顾问商讨，无图书档案可以查对，不论如何大事，皆以此法行之，可称滑稽已极。其间尚须窥探上旨，逢迎将顺，及排除异己，汲引私人，鬻卖差缺。故为军机大臣者，必须练就一套特殊技巧，否则只有装聋作哑而已。以此而称为政府，实极矛盾。盖清代之不信任汉